

## 知青工

□ 合肥 日月

二十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,有一个名词叫:“知青工”。这是一个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的名词、特殊的符号、特殊的产物。

在那一时期,有大批知青纷纷从农村返回城市。而城市又一时又没有那么多的就业岗位,能安置那么多的返城知青。故尔许多知青企业仿佛在一夜间,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地大量涌现出来。这类企业属集体所有制,主要用来接纳和安置本系统职工上山下乡子女返城就业。我十分荣幸也成为其中一员。

记得那年10月的一天下午,我接到母亲所在单位主管部门,合肥市政工程管理处的通知,要求本系统职工无工作的子女去进行待业情况登记。我得知后,当即带着户口簿、高中毕业证前去登记。一到单位,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,十分胆怯地敲响了劳动人事科的门,一位干部模样的40多岁女子一听说我是来填报待业情况的,十分热情地把一张表递到我手上,说:“你先把表填一下。”我一接过一张印有“待业青年登记表”字样的表格,仔细看了一眼,就取出挂在上衣口袋里的钢笔,认真地填写着……表填好后,我小心翼翼地递交上去。她拿着我的表,仔细检查一番后,抬起头冲着我说道:“你家已有人下放到农村,你符合留城政策。但现在整个系统像你这样情况的人也不少,而且本系统暂时还没有招工计划。你要体谅单位的困难,先回家待业吧!”“那要待业多久?”“这个,我也说不清楚。”“哦!”“你要是在家实在着急,可以先到你母亲单位做个知青工。”我一听到这一消息,喜出望外,高兴地连连点头。

虽说这只是一个知青工。但在那个年代,能找上一份工作,实属不易。那时,高中一毕业,就业渠道也很窄。不外乎有这样几种:第一考上大学;第二参军;第三招工进厂;第四顶替。就是通过父母中的一方提前退休,让子女顶替。我下放到农村的大姐后来回城工作,就是通过我母亲提前退休,才顶替回到城里的;第五做知青工;第六上山下乡;第七待业青年。我算比较幸运的,毕业不久,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知青工。

我做知青工的那家单位,叫合肥市政第四筑路工程队。从字面上,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单位是修、建城市公路的。一上班,我才知道,这个单位除了有四十多名老工人外,还有十几位下放知青回城当工人的,以及六七个招工进来的。真正意义上做知青工的,连我加起仅仅只有5人。修路、建路,全在野外工作,风吹日晒,而且全凭力气干活。天天在公路上“背朝太阳,面朝黄土”,干的是“修地球”的活。填路基,是用小板车一车一车地拉沙石;挖土方,是用箩筐,两人一前一后,一箩一箩地抬;铺水泥,是一锹一锹地拌水泥砂浆;样样工作,全靠人工。就连浇沥青,也完全靠人工,拌沥青,先得要把沥青放进大锅灶,架起柴火烧,等烧化沥青,再拌上石子,然后一锹一锹地往路基上撒。这撒,绝对是一门技术活,撒的一定要均匀。撒得不均匀,路面就会出现高低不平。撒好沥青后,再用压路机压上几个来回。尔后工程技术人员会拿着一把水平尺,往路面上一放,看看路面是否平坦。水平尺中的红色水注得在中间位置,偏左或偏右,都说明路面不平,就得返工。一天工作下来,不仅累得腰酸背疼,而且还弄得浑身上下脏兮兮的,脸上一抹几层灰。有时下班,坐公交车,怕一身灰,沾到别的乘客身上,还得钻进工棚换上一身干净衣服。

那时上班,也是“居无定所”,人跟着工地走,可以说是走遍了合肥的大街小巷。往往还是那儿人多,就在那儿干活。刚开始在城市繁华大街上干活,浑身不自在,害羞在工地上遇见熟人。往往越是害怕,越是能遇上熟人。有时熟人可能还没看到自己,自己的脸,却“唰”地一下红到耳朵根。

就这样,我做了几个月的知青工后,恰好赶上扩军好时期,便背着父母,背着工友,偷偷跑到街道报了名。当几个来合肥接兵的接兵团从区人武部了解到:我是当年合肥从在校生中“招飞”复检时给“涮”下来的人之一,便一下子成了几个接兵团“争抢”的“香饽饽”。俗话说:军中无戏言。就在这年11月下旬,合肥市发放的第一批应征入伍通知书中,我名列其中。我终于穿上了绿军装,阔别了知青工,到了北方一座直线加方块的军营,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。

这一经历,虽已相隔40多年了,但我至今还是难以忘怀的。尤其是每当我走过我当年参加过大寨路(现称“金寨路”)、大庆路(现称“长江东路”)、当涂路(现称“东二环路”)建设等这几条宽阔而繁荣的大路上,总是感慨万千!

改革开放40多年来,合肥市政建设迅速发展,并发生日新月异、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而在这一变化中,也曾有过我的辛勤汗水。一想到这,我顿感欣慰和自豪。

## 最易实现的梦想

□ 合肥 范家生

没有谁,能够随随便便成功;但高考,却可能是人生最容易实现的梦想。1991年的7月7、8、9三天,高考,正逢安徽下大雨。考点在来安县城,离我们半塔镇将近60华里。为了熟悉考场,学校5号下午就组织我们考生到县城熟悉考场,住在一个招待所,每人交160元。看着同学们大包小包的学习资料,再瞅瞅自己肩上的那只黄挎包,一脸轻松。在接下来没日没夜的5天暴雨中,我们结束了为期3天的考试。因为明知考不上,所以也就无所谓,因此创造了全县地理考试第一个交卷的记录:提前45分钟。一出考场就被董校长发现:你怎么这么早交卷,能考多少分?我大胆地说:80分没问题!好,考不到,我再收拾你。分数出来后才发现还是多说了两分,但校长没收拾我。

正是高考,第一次走出小镇的我把县城逛了个够,接连看了三晚录像,打了两晚台球,至今难忘。然而,让我始料不及的是成绩出来的时候,我竟然排在全校文科应届第八名,这让从没进入班级前二十名的我感到十分意外,就连班主任姚老师也感慨:你小子如果好好学习是能考上的。这句话让我回味了许久,也记忆了终身。

高考,加速成长。为了理想与追求,那年冬天,我穿上军装到了北方一个军营,但考军校必须当兵满2年才能参加军招。于是在训练之余,利用双休节假日战友娱乐的时间学习文化课。因为学的是文科,所以物理化学从头学起。部队纪律严,吹哨起床,拉号熄灯,根本不许你违反作息制度,只能在晚上偷偷打手电躲在被窝里看书。一天被查铺的营长发现,破例准许我

在营部会议室学习到晚上11点。

1995年3月,我参加部队军招预选,接着体检、军事考核,层层挑选,步步考核,然后集中到教导队参加集中学习培训,两件事最为难忘。

争名额。军招有名额控制,而且分兵种。因为我们是炮兵,所以炮兵专业名额多,但我偏偏学的是侦察专业,名额少,少到只有一个指标。也就是说,一个指标只能一个人参加招考,不论考上考不上。当时,一同集训的侦察专业十个人,自知争名额无望的战友便转了专业,最后只留下五个人,而且还有位一个车皮拉过去的老乡。但我坚决没有改选专业。种种机缘巧合,我成为幸运儿。二十五年过去了,我清楚地记得1995年6月29日,那些没能获得参加军招名额的战友,是怎样流着泪离开的学习班。另一件是备考。三月底到教导队集中学习,近百天的备考,我整整瘦了8公斤。因此,到军区总医院体检抽血的时候当场休克。考试前明显感觉精力不够,买了两盒太阳神口服液,那时非常流行,的确管用。

考完回到营房,高营长迎头就问:小范,怎么样?报告营长,绝对考上。营长高兴地拍了拍我的肩膀:好,拿下,像我带的兵!8月4日,干部科长打电话问我:小范,你能考多少?我估计自己能考290分左右。实话实说。科长高兴地说,不错,361分。那年军招,济南军区最低分数线271分,5000多人考试,全军第一。我们旅是集团军第一,72个战友考上59人。

在领导和战友的关心关怀关爱下,1995年8月,我终于跨进中原一所军事院校的大门,实现了儿时的梦想:走进大学。

## 父亲老了

□ 淮北 李同领

小时候,我很顽皮,在兄弟姐妹四个当中,被凶得最多。每当犯下错误,父母的教育方式是截然不同的。母亲动不动使用棍棒说话,父亲就柔和多了,总是说服教育,因此,那时从心底来说,我害怕母亲,对父亲,一点也不畏惧。有一段时间,我总是故意和他对着干,他让我向东,我偏向西。比如练字,他让我练,我推说手疼没劲,他就用严肃的目光一直盯着我,过一会儿才说:练字去,我偏不听,一溜烟跑出门去,最后是母亲拿着擀面杖,把我赶回到书桌前。从那时起,我对父亲的目光有一种莫名的害怕,我发现父亲的目光里藏着一把刀,那个明晃晃的东西,一不小心就刺伤了我幼小的心灵。时隔多年,我脑海里经常浮现父亲那严厉的目光,那目光,是如此的坚毅与恐惧,就那么一直瞪着我,鞭策着我。

父亲是一个非常爱面子的人,他的好客在十里八村是出了名的,只要亲朋好友来了,哪怕是路过门口,他都会拉进家里,好烟好酒招待着,村里哪个好酒的主儿要是犯瘾了,就会来找他,喝上一阵子再走。为了这事,父亲和母亲没少争吵,童年的我,一直不明白父母为什么每天总是在争

吵,一个家过得风雨飘摇不说了,还整天没头没脑地吵个没完,那时,总感觉时间过得真慢,一心只想早点走出这个家。

后来,上了高中、大学,参加了工作,离开了那个家,自己成了家,才渐渐开始理解父母。母亲常说,不希望你们大富大贵,只希望你们在身边就好,父亲也经常打电话说,工作要干好,孩子也要教育好,现在孩子以你为荣,将来你以孩子为荣。我知道,只要他们还在,总有操不完的心,使不完的劲儿,继续不停地为着儿孙们操心。

前不久,姐姐打电话说,父亲病了,我急忙给父亲回过去,他若无其事地说,没事,就是最近有点犯困,我从电话中听得出来,他说话有气无力,那一刻,我突然明白:人的老,是瞬间的。带父亲去医院看病,等医生的间隙,父亲无事可做,在医院门口踱来踱去,那一刻,我觉得寒风中的父亲,身材是那么矮小,经不起一阵风。而就在一瞬间也明白,父亲,真的老了。

医生说,犯困的主要原因是血脂高,神经性衰退,老年痴呆症的前兆,也就是常说的阿尔兹海默病,父亲会渐渐忘记近期发生的事情和身边的人。父亲,终究会忘记我是谁。可父子一场,我记得就好。